

大国粮仓里的中国故事

2020年，在全世界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时刻，中国社会始终保持稳定，这其中粮食和重要农副产品稳定供给功不可没。

日前，大型纪录片《大国粮仓》在央视播出。这部片子明确地告诉所有人，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70多年里如何端牢手中饭碗的光辉历程。

为了中国人吃饭问题,仅在两年多的时间里 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有115次

“世界什么问题最大，吃饭问题最大。”这句话，是1919年毛泽东在《湘江评论》创刊宣言中明确指出的。民以食为天，此言自古不虚。

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放言：中国人口众多，没有任何一个政府，能够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。

尽管艾奇逊这话是“戴着有色眼镜”式的偏见，但也指出了我们当时面临的现实：人口多、粮食少、大面积荒地盐碱地、产能低下……这些都是拦在解决中国人“吃饭问题”面前的绊脚石。

然而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，就是善于将不可能变为可能。60多年前，曾有一份紧急报告被送到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。报告显示，北京、天津的粮食库存只够用四天，而上海只够两天。

面对缺粮问题，为了解决亿万人民的吃饭问题，周恩来亲自指挥调运粮食，被称为“粮食调度的总指挥”。

时任粮食部党组书记的陈国栋回忆说：“去总理处，主要是谈粮食问题。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们去，地点经常是他的办公室。有时是晚上九十点钟或深夜十一二点去，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；有时是凌晨二三点去。”

周恩来在听取汇报时，总是自己用笔计算数字：各地库存有多少，每日销售多少，可以调出多少，粮食存放在哪里等。为了解决粮食调拨中的运输问题，周恩来还同外贸部商量，迅速进口了1200多辆汽车交粮食部使用，大大增加了中央的运粮能力，在调运粮食中起了重要作用。

据统计，仅在当时两年多的时间里，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有115次，在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的32张报表中，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。

这些并不久远的往事和历历在目的数据，一遍遍告诉我们党中央为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所付出的心血。

70多年来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迎难而上，用吃苦耐劳的品性战胜天灾与贫瘠，用科学有效的政策创造举世瞩目的伟大奇迹。

用世界9%的耕地，养活世界20%的人口。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都一一变为现实，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奇迹——从曾经的“吃不饱”，到实现“全面小康”。

改革开放后，我们的追求从“吃得饱”转向“吃得好”，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“插上了科技的翅膀”，用“卫星导航”实现插秧机自动插秧，大大节省人力物力；用“稻蟹共生”“稻鱼共生”“稻鸭共生”等天然生态的种植方式，实现让人们吃得安全、吃得健康。

“大国粮仓”的伟大奇迹，不是我们用嘴说出来的，而是有着精确的数据支撑：

看产量，从1949年粮食年产量2000多亿斤，到如今连续6年每年稳定在1.3万亿斤以上；牛羊肉产量也比新中国初期增长了几十倍；

看库存，如今稻谷、小麦等粮食的库存量，能够满足14亿中国人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；

看品种，14亿中国人每天要吃掉12亿多只鸡蛋。中国水产品总量已连续32年保持世界第一，全世界近70%的西瓜、32%的柑橘、50%的苹果、98%的杨梅，都来自中国。而且，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蔬菜生产和消费大国。



美丽乡村好风光，初夏田园插秧忙。（资料图片）

一粒大豆让北大荒变北大仓

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，那里有森林煤矿，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。”这首歌，曾经让多少人听了伤心、听了落泪。

这首歌中提到的大豆，是中国重要粮食作物之一，至少已有五千年栽培历史，古称菽，以黑龙江大豆最为著名。

就是这一粒大豆，在物资紧缺时代是“替代粮”，到富足时代成为“饲料粮”，折射出中国人民的饭碗在70多年里发生的巨大变化。

上个世纪50年代，14万转业官兵奔赴“天苍苍，地茫茫，一片衰草枯苇塘”的北大荒，为刚成立的新中国“向荒原要粮”。

这一行十几万人中，有很多英雄，比如电影《渡江侦察记》原型之一、12次战功荣立者王树功。

十年后，又有54万知青来到北大荒，屯垦戍边，保家卫国。

北大荒，成了北大仓，更成为数代人永恒的生命记忆。

今年已经70岁的胡国华，就是来自上海的一名知青，他退休前是北大荒育种中心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，国家大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。

当年，胡国华说：“人活在世上总得干点事情，我不愿这么默默无闻地活一辈子。我是学农的，专业是育种，回到上海专业不对口，总不能回去混日子吧？”

于是，胡国华选择留在东北，成了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。1989年，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他“世界模范农民”称号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中国政府开始加大对饲料行业的支持力度。随着饲料工业的发展，豆粕逐渐成为中国大豆消费的主要用途。大豆制品的消费也在逐年增加。双重需求之下，中国的大豆缺口开始显现。

1987年，胡国华到加拿大农业部农业科学院进行大豆育种学习，师从世界遗传学会主席帕什和加拿大著名大豆专家诺姆·沃丁。

“你得表现出来中国人不比他们差，他们才能尊重你。”

胡国华做到了，加拿大的专家接纳了他，加拿大的资料库向他开放了。他写出的大豆产量育种论文，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。

于是，加方向胡国华伸出橄榄枝，希望他能留在加拿大。胡国华的名字中带有“国华”二字，他最终毅然选择了回国。

胡国华回国，带回来的不是什么国际知名产品，而是足足两大箱、600多份研究资料。

胡国华，只是若干农业科研大军中的一员。

在黑龙江省农科院黑河分院，为了培育出高产、早熟、适应性强的大豆良种，研究团队一年四季都忙碌在试验田和实验室里，他们培育出的“黑河号”大豆品种，每年推广上千万亩，使大豆增产近2亿公斤。

201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“实施大豆振兴计划”，扩大种植面积也被当成一个重要的目标。

2020年，中国的大豆种植面积达到1.48亿亩，比上年增长825万亩。这年收获196亿公斤大豆，比上年增长15亿公斤，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新高。

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，农业基础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削弱，手中有粮、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。（据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）

看古代名师如何培养学生

颜之推、胡瑗、王通、颜元教育学生的故事,值得后人学习

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,数千年来,中国历史上涌现出了许多名师,培养出了众多栋梁之才。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颜之推、胡瑗、王通、颜元这四位古代名师是如何培养学生的。



左起:颜之推、胡瑗、王通、颜元画像图

胡 瑗 率学生畅游大好河山 督促他们学射箭和音乐

胡瑗(993-1059年)，北宋著名教育家，因世居陕西路安定堡，世称安定先生。宋仁宗景祐元年(1034年)，范仲淹迁知苏州，创建了“苏学”，聘胡瑗任教授。庆历二年(1042年)，应滕宗谅之邀出掌湖州府学。在湖州任教九年，胡瑗教学有方，其订学规还被朝廷取为太学法。

胡瑗在教育学生时，责任心很强，“视诸生如其子弟，其父兄。”欧阳修称赞他“教学之法最备”。

据清代丁宝书《安定言行录》一书记载，胡瑗曾指出：“学者只守一乡，则滞于一曲，则隘者卑鄙。必游四方，尽见人情物态、南北风俗、山川气象，以广其闻见，则为有益于学矣。”为此，胡瑗带领湖州的学生游览关中，登高远望，北方的雄伟山河跟南方的秀丽风景迥然不同。胡瑗对学生说：“此可以言山川矣。学者其可见之哉！”

胡瑗不但指导学生学学习，还督促他们锻炼、休息和娱乐。他在湖州州学建立了射堂和乐斋，学生除了学习自己的专业，还要学习射箭和音乐。他的教法不但被宋人传为美谈，即使过了六七百年，清朝人还在仿效。

胡瑗的弟子遍布朝野，其中最出名的当推北宋理学大师程颐。

王 通 注重教材教法的改革 培养出多位开国功臣

王通(584-617年)，隋末著名教育家、思想家。隋仁寿四年(604年)，王通开始《续六经》的整理和写作。九年后，《续六经》完成，王通名动天下，四方学子远道而来，向他学习辅君为政之道。王通在黄颊山、白牛溪办学，学生之多，当时号称门下一千人。他被视为孔子一般的人物，他讲学的白牛溪也被称为“王孔子溪”。他教育出来的学生，有魏征、薛收、温彦博、杜淹、杜如晦、陈叔达等大唐开国功臣。王通的教学思想被收录到了《中说》一书中。

王通十分注重教材、教法等方面的改造与发展。据《中说》记载，王通在教法上也进行改进，根据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，不断充实和改善教材的内容。

王通非常重视道德修养，并提出了提高道德修养的相关法则。他要求学生成为道德高尚的人，要有远大的志向。这些主张成为王通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，也是他儒家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。其中的不少概念和提法是有创造性的，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影响，也为后世学者广泛地借鉴。

颜 元 身体力行推动全面发展 要求学生成就超过老师

颜元(1635-1704年)，清初进步的思想家和教育家。颜元的“实学”教育思想主要内涵是“实行、实文、实体、实用”，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素质教育。

颜元在河北肥乡县主持漳南书院时，进行了书院教育的改革尝试，和学生一起“讨论兵农、辨商今古”“习礼、歌诗、学书计，举石、超距、击拳”等。

颜元特别重视六艺的学习。据《习斋事谱》载，颜元不仅在课堂内教授学生六艺知识，他还经常和学生一起到课外去实训。有一次，颜元带领学生到野外举行射箭比赛。他连发六箭，箭箭射中靶心。等参加比赛的学生们都射完以后，颜元发现，学生中成绩最好的也只射中两箭。学生都称赞老师是“神箭手”，颜元却说：“孔圣先师当初也教了好多学生，其中颜回的仁义宽厚超过了孔子，仲由的忠勇果敢也在孔子之上。而我教了你们这么多人，别说超过我，就是赶上我的人也没有，我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？”

学生们恍然大悟，暗下决心，努力奋进，学业突飞猛进。其中李塋(gōng)成了著名的学者，他继承并发展了颜元的学说，后被称为“颜李学派”。（据《厦门晚报》）

红色宝库 奋斗百年

正红色的封面，内里详细记录贫困户的基本信息、主要致贫原因、帮扶责任人、帮扶措施和帮扶成效……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的档案室，存放着十八洞村当年130户建档立卡户的扶贫档案，每份档案里都有这么一本扶贫手册。

“里面记录的每一笔，都是我们帮扶对象的生活变化。”花垣县委驻十八洞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副队长龙振章介绍，这是专门用来建档立卡、因人施策的“扶贫手册”。

小册子里的脱贫“密码”

2013年11月3日，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十八洞村，首次提出“精准扶贫”。

“精准”二字，迅速成为脱贫攻坚的重要着力点。很快，花垣县委委派的精准扶贫工作队进驻十八洞村，开始识别贫困户。

精准识别出贫困人口后，更需精准制定帮扶政策，扶贫手册应运而生。一本本扶贫手册，让扶贫工作更加一目了然、有的放矢。查看扶贫手册等资料，聆听贫困户的需求，并一一记录在册，成为扶贫干部的日常工作。

十八洞村村民杨秀富家，是精准识别出的贫困户，扶贫手册上写的帮扶责任人是“花垣县扶贫开发办的麻文权”。结对帮扶干部、扶贫工作队、村支两委与杨秀富商量后，“量身定制”了帮扶措施——医疗帮扶、引导开办农家乐等。如今，杨秀富一家早已摆脱贫困。随着游客越来越多，杨秀富的农家乐生意红火，去年全家总收入123023元。

“我一直留着这本扶贫手册，这是党的好政策，我要留作纪念！”杨秀富说。

2016年，十八洞村成为湖南省第一批出列的贫困村。一本本扶贫手册，在退出历史舞台的同时被载入党史册。（据新华社）

—— 拾遗 ——

陈寅恪讲课时的“笑”

翻译家许渊冲抗战时考入了“西南联大”外文系，可对其他系著名教授的课，也去旁听。在大二学期初，他旁听了陈寅恪教授一堂“南北朝隋唐史研究”的课，留下了一些有趣印象。

陈寅恪在学校极为有名，学子们有传说，譬如说英国牛津大学请他讲学，因为战争原因，没有前去等，这当然形成光环效应。许渊冲将此记入日记。具体说到讲课，许渊冲在很短时间，听到陈寅恪几次大笑，他说陈寅恪讲课时：“两眼时常闭上，一只手放在椅子背后，一只放在膝头，有时忽然放声大笑。”这个动作很是形象。陈寅恪的课，每周只是两小时，可他只讲一小时，而且每两周来一次。

陈寅恪的课，多给研究生上，所以许渊冲说“因为研究生注重课外阅读。他(陈)说图书馆无书可读，只好沉思默想，这时大笑一阵……他说同学有问题可以问他，如答不出，就说不知道。中学老师这样说要被赶走了，但大学教授如果什么问题都答得出，那还需要研究做什么？这时大笑。”

陈寅恪还说，提问题“不可太幼稚，如狮子项下铃谁解得？解铃自然还是系铃人了。这时他又大笑”。对问题，陈寅恪还有要求：“也不可以太大，如见帆动，问心动不动？这是唯心唯物的大问题，回答不可能精。最好能提短小精悍，承上启下的关键问题，如杨贵妃就是唐史的一个关键，因为‘玉颜自古关兴废’嘛。”这样的要求，对学子做学问，研究课题，也是很好的启示。

陈寅恪在这节课最后说：“专回答不讲解，中国大学还行不通，所以每两周讲一次，讲的材料不是正史，而是稗官野史之类。”这些，陈寅恪是启发学子要广博泛览，不被所谓“正史”拘牵。听了陈的课，许渊冲评论：“陈先生讲得有味。无怪乎目中无人的刘文典先生只佩服他一个人了。”（据《人民政协报》）

失败何以称“败北”

古往今来，两军作战，被打败的一方为“败北”；运动场上比赛，负方也是“败北”，是否失败者都向北方逃走呢？事实上，中国历史上大的战役，打败仗的大多是向南方逃跑，为何不说是“败南”呢？原来“败北”之“北”，并不等于东西南北方位的北，优胜劣败与方位无关。失败之所以称“败北”，需从汉字“北”说起。

“北”是个会意字，甲骨文、金文、小篆等字像是由两个侧立的“人”组成，构成二人背靠背之形。“北”的本义是背靠背，有乖违、违背的意思。《说文解字》：“北，乖也，从二人相背。”段玉裁注：“乖者戾也，此于其形得其义也。军奔曰北，其引申之义也，谓背而走也。”如《战国策·齐策六》：“食人炊骨，士无反北之心。”这里的“北”字就是背的意义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吃人肉果腹，烧人骨取火，而士兵没有反叛、背离之心。

军队打了败仗逃跑的时候总是以背对着敌人，所以“北”引申指败、败逃。《孙子兵法·军争》：“佯北勿从。”意思是，敌人假装失败退却，切勿追赶。《韩非子·五蠹》：“鲁人从君战，三战三北，仲尼问其故，对曰：‘吾有老父，身死莫之养也。’”意思是：鲁国人随着君主打仗，三次去三次败逃。孔子问他的原因，他回答说：“我有一个老父亲，我若是死了就没人养活他了。”“战败溃逃为“败北”，而乘胜追击则为“逐北”，成语“追亡逐北”就是追击败逃的敌人。

秦汉以后，“败北”逐渐成为一个常用的双音节词。例如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：“吾起兵，至今八岁矣。身七十余战，所当者破，所击者服，未尝败北。”再后来，“败北”不仅指军事失败，还引申为办各种事情的失利。而在现代汉语中，“败北”还被用来泛指在各种竞争、竞赛(如体育比赛、竞标、竞选)中失败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“北”被借用成为表示方位的字，与“南”相对，指北方，如《列子·愚公移山》：“本在冀州之南，河阳之北。”“北”何以会被借用呢？一般认为，古代宫室都是背北面南，因而以相背之“北”作为南北之“北”。同时又在“北”字的下面加个形旁“月(肉)”，造出一个分化字“背”（“北”成了声旁），表示背脊、背向的意思，而“背”的初文“北”就成为方位专用字了(在文言词语中，“北”仍兼表败逃之义)。（据《西安晚报》）